

■访谈

见自己 见天地 见众生

——访李鸣生 □本报记者 任晶晶 吕漪萌

李鸣生 1956 年生于四川简阳,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协报告文学专委会委员。著有长篇纪实文学“航天七部曲”和《中国 863》《国家大事》《全球寻找“北京人”》《与智者聊天》《震中在人心》《绝地重生》《后地震时代》《德能无量》《敢为天下先》等 20 余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本报记者采访了李鸣生。在回顾自己创作历程时,他说:“我的创作,也许就是一个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的过程。”

记者:1973 年底,您作为文艺骨干被招入伍至西昌发射基地。您是如何从这里一步步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

李鸣生:在西昌发射基地那十几年,我的创作道路走得很艰难也很曲折。当时的西昌发射场还是一片与世隔绝的不毛之地,我能看到的读物只有《解放军文艺》和《解放军报》,根本无法满足我对知识的渴求。在精神的孤独与苦闷中,我只好抬头望天,把天空变成灵魂的居所和窥视世界的窗口。这段时间虽然遭受了精神和身体的双重磨难,但生活却成为我创作的一笔财富。

不久,我被调入部队宣传队,一边参与文艺节目的创作,一边在乐队当乐手。1977 年宣传队解散,迫于现实的原因,我烧掉所有的创作手稿,放弃作家的梦想,开始改学理科。正当我下决心成为一名计算机专家时,也许是命运的捉弄,组织上又让我去当文化干事,于是又做起了作家梦。1981 年 8 月,我在《凉山文艺》发表了第一首诗作《山泉》,暗夜中的我仿佛看到了一束文学的光。

记者:1982 年,您以青年诗人的身份登上文坛,但 1984 年却告别诗歌,全力写作报告文学,这是为什么?

李鸣生:1982 年到 1983 年,我连续两年在“全国诗歌写作竞赛”中获奖,这让我对写诗有了自信。但 1984 年秋天,我在参加由《山西青年》举办的“中秋诗会”时,第一次见到了当时诗坛不少著名诗人,让我看到了诗的大海,感到了自己的渺小。从杭州回来后,我便决定不再写诗,改写小说。1984 年 4 月 8 日晚,我在西昌发射场第一次亲眼目睹了中国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的发射全过程,在“长征三号”火箭腾飞的那一刻,我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人类智慧与力量的伟大。就在这个众人狂欢的夜晚,我面对浩瀚的星空,发誓说:我一定要写一本书。于是决定暂时放弃小说的创作,改写报告文学。实际上,那时的我只有满腔热情,根本搞不清什么是报告文学。

1984 年,我发表了报告文学处女作《用生命编写程序的人》,后来又发表了中篇小说《火箭今夜起飞》、中篇报告文学《月亮城的风采》等。1988 年,四川巴金文学院接纳我为“创作员”,此时的我尽管发表了数十万字的中短篇,但依然感到很茫然。直到后来长篇报告文学《飞向太空港》的问世,才算找到了自己创作的方向。

记者:《飞向太空港》最早发表在《当代》1991 年第 1 期,随后由作家出版社推出,并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这部作品是怎么诞生的?为什么 27 年后还能再次掀起人们的阅读高潮?

李鸣生:《飞向太空港》的创作说来有点偶然。1989 年我考入军艺文学系,3 月的一天,我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说中国的长征火箭要在西昌基地发射美国的卫星。当晚我就睡不着觉了,脑海中好像突然划过一道闪电,感觉一部好作品已在心里诞生了。于是我请了一周的假,连夜赶回西昌基地采访,用 3 个月写出了 25 万字的《飞向太空港》。书稿出来后送到有关部门审查,却说不可能发表、不能出版。但我还是顶住压力,坚持不改,坚持发表了,当时承担的压力与风险可想而知。一晃 27 年过去了,说实话,这部书我都快忘记了,没想到今天又受到大家的珍爱。主要原因可能是这部作品题材独特、思想超前,思维方式也有点与众不同。当然,能经受得住几十年时间的检验,也说明作品有一定的生命力。

记者:20 年间,您以“航天七部曲”书写了中国人开创空间文明的历史。当时您为什么选择航天题材?

李鸣生:我总是固执地认为,一个作家想写什么、能写什么,并不完全取决于作家本身,冥冥中似乎还有一种所谓“天意”的东西在左右着你甚至主宰着你。我最初选择航天题材的写作,如今想来就像是命运的一种安排。当然,现实的理由也是存在的。我当兵就在西昌发射场,15 年的青春生命都是在发射场度过的。这段生活融进了我的血液,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如果不有所表达,对不住那些在原始的大山沟里默默苦干、奉献了一辈子的战友们。此外,我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有人创造就得有人记录。中国的航天历史是人类史上一段神圣、伟大和惊心动魄的历史,这段历史无疑应该有人记录,否则就是一个空白。我是从发射场走出来的作家,由我来书写这段历史,我感觉多少有点历史使命、责无旁贷的意思。多年的走访,我深感中国航天领域确实蕴藏着一精神,即航天精神。航天精神的核心就是讲真话、干实事,无畏权力,坚持真理,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上不违背天道,下不糊弄百姓。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科学精神,我想通过写作呼唤这种精神。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文学需要不断发掘新的领域,拓展新的创作空间。人类自 1957 年起就进入了航天时代,但写人类创造陆地文明历史的文学作品居多,写人类开创空间文明历史的作品却极少。而中国的航天史就是中国的空间文明史,也是人类的空间文明史。所以,我写“航天七部曲”,其实是在写中华民族开创空间文明的历史;同时也试图为中国文学开辟一个新的领域,打开一扇新的文学天窗。

记者:从“航天七部曲”到《震中在人心》,有评论家说您是从天上回到人间,作品



发生了由“见天地”到“见众生”的转变,是什么原因促使您的创作发生了这样的改变?

李鸣生:2008 年汶川大地震突如其来,事前我没有一点创作的准备,事后我先后 6 次深入灾区走访,甚至住在灾民家中,与灾民同吃共寝,朝夕相处。在灾区走访的日子里,我经历了山体滑坡、巨石滚落、泥石流以及上千次余震的威胁。有时为逃避余震,半夜三更还得爬起来匆忙转移住址。有一次我因气温高达 42℃,加上劳累过度,病倒在帐篷里,打了一个星期的吊针。在血迹斑斑的废墟上既看到了生命的不堪一击,又看到了生命的无比刚强,于是,我不得不开始关注底层生命,直面残酷的现实。几个月下来,不经意间,众生在我心中的分量似乎渐渐超过了天地。因为天上的事情固然重要,但人间还有更紧迫的问题。这些问题就现阶段的我而言,也许更需要重视,更需要反省,更需要书写,也更需要解决。于是我用 3 年完成了“地震三部曲”《震中在人心》《绝地重生》《后地震时代》。我将第一部书名定为《震中在人心》,就是要让“震中”这一地理学概念超越空间、超越时间,成为所有共同经历过那个重大灾难、惨痛悲剧的人心中一座记忆的“墓碑”,从而让“众生”成为作品的主角与核心。其实当我找到这个点时,我已经“见众生”了。可没想到的是,写完《震中在人心》,我的身体就发出了预警,我不得不吃了

“航天精神的核心就是讲真话、干实事,无畏权力,坚持真理,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上不违背天道,下不糊弄百姓。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科学精神,我想通过写作呼唤这种精神。”

80 多副中药,从此落下病根,加上此后我对中国几个重大冤假错案以及 600 万尘肺病人的现状又进行了 5 年的追踪调查走访,结果积劳成疾,大病一场,写作被迫中断。也就在这时,我真正地“见到”了自己,并开始重新认识自己,审视自己。

记者:日前,您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敢为天下先》问世,将“航展”这样一个看似平淡、不容易出彩的题材写得饶有趣味、感人至深,您是怎么做到的?

李鸣生:中国航展这个题材,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确实是个很枯燥、很乏味、很不讨好、也很难写好的题材。搞不好,就会顺从已有的思维定势和惯有的、落入概念化写作的俗套。十多年前,我就提出一个观点:反对概念化写作。因为面对类似的题材,几十年来中国多数作家都在进行概念化的写作,且写得风生水起,轰轰烈烈。这是报告文学自己推开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像航展这个题材也是很容易落入概念化写作模式的,但如果我们剔除“航展”这个概念,从航展的角度进入,用一种举重若轻的方式去写航展辉煌背后人物的艰辛、壮阔背后曲折的历史,写航展对城市的改变、对世人的影响,写珠海城的人文气质、开创精神,并坚持真实第一的创作原则,用事实说话,也许就会有意思一些。可惜,由于历史的局限和现实的某些限定,此书的遗憾不少。

■关注

刘斌立不是一位职业作家,他一直以来从事的是教育工作,也做青少年创意写作的推广,这些工作在当今都是十分受重视的。既被重视,就必定忙碌,但是忙碌的他,同时还驾着第三驾马车——写作。

教育、推广写作和写作,是刘斌立要同时做好的三件大事,十分不易,但是年轻的刘斌立却做得得心应手,风生水起,这三项事业,没有互相影响,恰是互相促进、互相弥补、相得益彰的。

虽然现在刘斌立将他的三驾马车都驾取得很出色,但是我相信,如果必须要放弃什么的话,刘斌立一定不会放弃写作。

他在奔波的人生中,能够将心情调适到最安静的状态,能够将思绪集中在文字之间,就因为他的身体里、灵魂中自带着文学的细胞、写作的热血。

同时,因为他的万里行走,因为行走中的体验和见识,更加煽动了他的文学情绪。就这样,一个人生中“动”的时间远远超过“静”的时间的年轻人,却一直在那里静静地写作。这真让人起敬,让人感佩。

读刘斌立的小说,情绪会被带起来,情感会被牵着走,他的写作,是令人感动的写作,文字带着体温,带着浓烈的情感。这个情感不是硬撑出来的,不是装饰出来的,是从心底深处流淌出来的,因为许多年的行走积累,许多年的人生历练,他有太多的感悟,有太多的想法,有太多的故事,要喷涌而出。

之前刘斌立一直在写微型小说,他的微型小说在业内颇受好评,曾数次获得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奖及国内微型小说的奖项,这次他寄来的书稿中,又有一部是微型小说集《东归》。

《东归》里有数十篇微型小说,据说这里边大部分的作品仍然和他以往的作品一样,是行走中的产物,在飞机上,在高铁上,在远乡的旅馆,在会议的间隙,就在某一个不固定的地方,写作。

行走的好处是积累,他可以比同龄人看到更多、感受更多、想的更多。但是同时,一个人如果长年的飞行、奔波,身心、情绪和精神肯定是动荡的、杂乱的、不稳定的。但奇怪的是,这些动荡、这些不稳定到了刘斌立的小说里,却化身成了另一种感觉:简洁明快、沉静舒缓。

刘斌立的微型小说,语言是舒缓的,节奏是均衡的,故事是明快的,设想在颠簸的路上,如何才能写出那种能够直击人心深处的宁静和深邃,这是刘斌立的文字功力、文学功力,这些源于他对于文字和文学的执著和坚守。比如《虚铜》《这里诺尔的车辙》等,无不让人从简洁中体悟出深刻和厚重。

这里,我更想说的是他的中短篇小说集《后海南沿》。刘斌立的这部分小说,尤其是其中的中篇小说,很有个性,很有力度,鲜活生动。阅读的时候,差不多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读完掩卷沉思,又让人心痛不已。比如《后海南沿》,我们读到、看到的,是纸上笔下的灯红酒绿、红男绿女,是世间的来来往往、熙熙攘攘,又是十分的接地气,当年轻一代的生活烟火气弥漫在字里行间,而文后留下的却是一种内心的伤痛、难言的空洞,是无尽的等待和孤寂。作者以轻松的时尚的口吻,以调侃的活泼的语言,写人生、写爱情,写得轻松,读后却沉重,作品的言外之意,体现得十分充盈饱满。这可以说是一种以轻写重的典型代表作。

刘斌立中短篇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结构十分精致,尤其是中篇小说,能以如此精致的结构来布局,实属不易,可见作者的用心、精心和耐心。在细节处理上,亦有它的过人之处,读到细致处,令人屏息凝神,比如写到外面大雨,反射出屋内的安静,安静到可以听到对方的呼吸声。这样的描写,作品中比比皆是,有一种轻车熟路,手到擒来的自然感。

刘斌立写作中所习惯的闲扯一笔也很有意思,因为收放自如,所以一点没有刻意的感觉,而是恰到好处。我们知道,小说是要讲故事,要讲好故事,但还不完全是讲故事。这种闲扯一笔又及时收回的文风,让人会心,十分贴心,给人启发,难能可贵。

刘斌立的小说题材很广泛,感觉就是他的脚步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文学的生发点,或者也可反过来说,是纷繁的题材紧紧追着作者,缠着作者,不写都不行。

刘斌立的行走,让他开拓视野,积累智慧;刘斌立的写作,是他的视野和智慧的文字实践;而行走与写作的结合,便有了刘斌立的这些极具个性的、散发出独特光彩的让人感动的文字。

行走与写作

——读刘斌立的小说 □范小青

■第一感受

一部颇具中国味道的诗集

——读龚学明诗集《爸爸谣》 □黄东成

我认识龚学明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他在大学时便与诗结缘,写诗发诗、谈诗论诗,我们常常见面。大学毕业他分配到媒体,更与诗难舍难分,算下来在诗坛摸爬滚打也已有 30 多个年头。他时时关注诗坛动向,近年现状令他焦急。龚学明有一个观点:中国诗歌应强化中国味道。与人民贴近,新诗才能成为主流文化,人民才能始终与诗歌不可分离。他的声音发出,引起广泛共鸣。

中国诗歌就该有中国味道。中国味道并不单调乏味,就如中国菜的八大菜系,各有绝不同雷的精美味道,诗歌也是,汉语言是全世界最丰富多彩无可比拟的,变化无穷。传统古典诗词的中国味,离不开风雅颂、赋比兴,兴观群怨,文以载道。新诗虽只百年,新诗的中国味道则既要有当代生活底蕴,又要继承文化传统血脉。新诗的美学表现多元,通感、象征、隐喻、暗示、比衬、变异、幻化、跳跃等等,他认为,诗不管怎么写,不管用什么形式,只要群众喜闻乐见,符合民族审美习惯、审美趣味、审美情思,都可谓“中国味道”,通俗如民谣、民歌、民谣,既有生活情趣,又有入生感悟和时空转换的思索,最易为大众喜爱接受。

龚学明最新出版的诗集《爸爸谣》,专以谣为书名,真切、实在地验证他的诗歌理念。“爸爸在天上/在地上/在干净的地方……/他欢乐,也低泣/爸爸的苦难圣洁/他自知,又/承载/现在,爸爸在天上/在地上/在干净的地方……/爸爸放下爱/自然释放晶莹和美/他在另一些圣人的路上/留下箴言和怀念//爸爸在天上/在地上/在干净的地方”。《爸爸谣》是诗集中作为诗题的一首诗。诗中三次出现循环往

复一咏三叹的句式,是传统歌谣中常见的,读者易读易记也易传诵。中国味道不仅是诗的形式,龚学明认为,核心更在诗的内蕴,隐含在内容和语言之中的诗质。“从历史中走出的我的爸爸/一生皆为婴儿/在光中行走/被水濡湿//他欢乐,也低泣/爸爸的苦难圣洁/他自知,又/承载……”这首哀悼父亲去世极度悲痛的含泪之作,凝聚了长年的舔犊之情,吟诵了父亲的人生遭际,也传达了父亲一生的波折转换,深一层追思,促使他不可抑止地追溯祖辈的家族史、村史,寻找他出生的故里故土。父亲对一家人的生活重负和对孩子的呵护与爱,凸显爸爸的勤劳一生与纯粹人格。

诗集中的 132 首诗均是以爸爸、以家乡为轴心展开,对爸爸和家乡的回忆、怀念、感恩、敬畏、孝心、追思,感情之真挚之纯真可以想见。“我的泾上村,我爱的相思/我的荒原,我无奈的宿命”,“你们没有认出我的悲伤/但认出我的面容/你们读出我深藏的泪水/以血地两字相赠……我爸爸不求富贵/荒原上的爱不多,但纯正”。《荒原》他 17 岁即离开家乡去上大学,童年、少年时代对家乡的记忆点点滴滴在脑海中泛起。“我的十七岁的分水岭/曾密布爱的水网”

(《地图册》,“爸爸的希冀和担忧/妈妈的泪水和叹息”(《行李箱》),“翻腾滚动,诗情迸发,使他在短期内集中写出了这部充满真挚深情的诗集。

龚学明并没有刻意给爸爸立传,对生活的深入观察、体悟、思考,借着父亲去世对感情的剧烈冲击,他决定以爸爸为核,围绕和拾捡起散落的爸爸的生活碎片和对家乡的感恩、敬畏,观照现今社会某些人群心态失衡的现象,极需要重新拾起被轻视被抛弃的传统孝文化,他有责任借诗歌对全社会心态环境整治作出接地气的呼唤。“我的爱追赶/爸爸的年龄在上/影子与影子交融/他用手指牵引一滴水的空洞”(《慈祥》)。

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百善孝为先,尊老爱幼,影响至深至远。人之所以为人的正直、善良、诚信、孝道、良知、义气等,几乎是亘古不变的人性美德,在维护社会稳定、增强社会凝聚力、培养个人道德情操、协调人际关系上,曾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生活中,龚学明是个敏感、敏锐又很有孝心和低调的诗人,他长期沉在生活中,很容易从生活中发现诗,捕捉诗,更何况是他自己几十年的亲身经历。“泾上村地多人少,三百

零七亩耕田/被我乡亲的汗水和泪水浸透/……六月快点走/六月不能走/风儿快点来/风儿不要来//快乐和苦难在催命/乡亲们的时间里争抢”(《六月》)。诗来自生活,但生活的原生态并不就是诗。诗需要从生活中发现、思考、提炼高于生活的思想感悟,他很善于去发现和思考,用诗的语言进行抒发和表达,以产生一种社会效应。他写家乡泾上村,一种非常复杂、非常矛盾的感情,“六月快点走/六月不能走/风儿快点来/风儿不能来”,短短几句将这种迂回曲折表现得淋漓尽致,引发多种遐想。

一首好的诗歌作品,诗人不会将要说出的全部倾囊倒出,而是含蓄内在不全吐露,让读者深入体味去创造另一半。试看龚学明以乐观的心态写家乡泾上村饥馑的年代:“还原苦难岁月,幸福的饥馑/夏天自顾自抒情:黄花菜嫩/南瓜在屋顶上孤独/晶莹的露水在狗尾巴草上/呼救;穷人汗多粮食少/我们的爱的单位正好”(《还原世俗》)。诗的抒情,不是直白的诉苦,给予读者的感受是多面的、积极向上的。

诗之良莠清浊,境界高低,可以考量作者的才气、学识、美学视野和人文修为。《爸爸谣》雅俗共赏,能为全社会各个阶层接受,这当然首先能与读者交流,让人读诗才能深入体味内涵诗意。龚学明的诗歌告诉我们,中国诗歌不能或缺中国味道,只有在带着我们民族骨血情愫,有筋骨、有痛感、有力度的基础上,吸收某些外国味道,以更丰富我们的味道。诗化的人性、神游的意象、浓郁的生活气息、动人心魄的境界,打着新时代印记的诗歌,应该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